



# 冷酷

〔苏〕 巴·尼林 著

〔苏〕巴·尼林著



邓学禹·吕宗兴译

# 冷酷

一九八六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永革  
封面设计：许大成  
技术设计：盛寄苹

冷 酷

〔苏〕巴·尼林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1/32印张10.5插页2 字数191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800册

---

书号：10118·996      定价：1.75元



我记忆中的乌泽尔科夫，仍是我们最初在值班室见到他的那副模样。

他瘦小体弱，头戴一顶灰色兔皮帽，身穿一件杂毛狗皮袄，腋下夹着一个帆布公文包。当时正是中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刑事调查局，亮了亮省报记者证，不是请求我们，而简直是要我们向他提供有趣的资料。“有趣的”——他正是这样说的。

让他注意的案件他看不上。他说：

“这算什么？这不过是偷偷摸摸罢了！请你们给我来点……”

说着他弹了个响舌，意思是让我们马上能明白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我当时还以为他对冒险家、投机商、赌棍、流氓无赖，以及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分子的案件感兴

趣，便从文件柜里取出一本像册给他。可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漫不经心地说：

“你们要知道，我不是西萨尔·龙布罗梭\*，对于相貌犯罪学我毫无兴趣。”

接着，他的两只耳朵不知为什么可笑地动了一下。

应当交待一下，他的耳朵很大，是人们称之为“招风”的那种耳朵。后来我们才发现，每当他急躁或生气时，他的这两只耳朵就会自己动起来，仿佛要适应一下主人那狭小得象小鸟的、长着一只肉头鼻子的脑袋。

这样的鼻子颇能使一位思想家，或者一位统帅增辉生色。然而长在这位乌泽尔科夫的脸上，却未免要使他失去几分神采。很有可能，他，乌泽尔科夫，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很可能感到自己的耳朵、鼻子，以及整个孱弱的身躯都会使人发笑，或引起人们的嘲弄和讥讽。为此，他本人便竭力摆出一副嘲弄别人的派头。

我早就发现，但凡是自身的生理缺陷而苦恼的人，往往要自命不凡、妄尊自大，常常是举止粗鲁，无事生非。

不过，乌泽尔科夫是否属于这一类人物，我就拿不准了。

---

\* 西萨尔·龙布罗梭 (1836—1906)——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代表人。 ——译注

我无意过分渲染他的形象，以免别人说我在事隔多年的今天还要和他过不去。不，我只想尽我所能，原原本本地，恰如其分地再现事物的本来面目。至于我要从乌泽尔科夫说起，从他出现在我们值班室的那一天开始讲这个故事，那只是因为我要讲的事情正是在他到来之后发生的。

当然，尽管头一天谁也无法预料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泽尔科夫神经质地抽动着肩膀，在我们值班室里踱来踱去。他用摊在手掌上的手帕大声擤着鼻涕，象吹喇叭似的。他说：

“请给我来点有分量的材料，下一步，由我去发挥。今天我要给星期天的报纸写一篇非同寻常的，别开生面的东西，懂吗？请来点离奇的案件！……”

“我给您找点有关巫医的材料好吗？”科利亚·索洛维约夫提议说，“这儿的巫医是非常摧残人的，应当在报上狠狠地批判和揭露才对……”

“敝人已经写过有关库洛明县巫医的文章，”乌泽尔科夫说，“其实，这并不是我份内的题材。我，恕我奉告，既不是工人通讯员，也非农村通讯员，我谁也不批判。我所要了解的是些重大的案件和事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就在于此……”

“啊，”维尼卡·马雷舍夫领会了他的意图，“我知道您要什么。我这就去拿……”

我们大家都想取悦这位首次光临我们杜达里县

的省报代表。我们这座县城，如同从前导游指南上所说的那样：虽座落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中间，却因西伯利亚道路坎坷崎岖，转车不便，很少有人前来旅游。

从省府到达杜里城可以坐船，也可乘火车，骑马顺着驿道走也行，不过至少要走五天。

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下决心千里迢迢来这里旅行的，更何况明知途中随时都会遭到土匪的袭击。

二十年代初，这一带的土匪很多。

在这些土匪中，甚至还有一些在国内战争中全军覆没的白军将领在活动。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杜达里县的土匪中，这样的将军或上校已经没有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别支队曾经狠狠地把这些匪帮收拾了一通。如今这支部队正继续向太平洋沿岸的方向挺进。

不过，几次重大战役之后，杜达里四周仍然有土匪在活动。虽然他们已经大伤元气，却并未虚弱到足以在通报中可以写上“夜阑人静，平安无事”的地步。不，如此平静的夜晚在杜达里县还不曾有过，也极少碰到平静的白天。

而在杜达里四周的泰加森林里更是土匪麋集，多如牛毛。他们杀害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袭击合作社，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并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在居民中间煽动对新生政权的不满，在农民中间制造骚乱，以此招募同党，拼凑自己的队伍。

来往这一带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每一个冒险前来本地的人，都是好样的。我们对他们总是亲切相迎，盛情款待的。

省报的记者更可以指望受到格外殷勤的接待。

不错，他来到我们这儿时，正遇到暂时的平静。

眼下正是冬天。在这隆冬季节，就连臭名远扬的匪首科斯佳·沃隆佐夫，一个富农的儿子，高尔察克手下的中尉，自称为“全泰加林之王”的狂妄之徒，也要暂时停止烧杀抢掠，把匪帮带进深山老林，在茫茫的雪原里隐蔽起来，等来年春天再倾巢出动。

匪帮在冬天活动要比在春夏两季冒更大的危险。因为春夏两季，在暴风雨刮倒的树木和杂草丛中最易销声匿迹，甚至连马蹄印也不留下。

冬天，就连兹洛特尼科夫、克洛奇科夫、韦克舍戈诺夫这样一些匪帮头目也都远远地避开城镇。

在城里，冬天作案的通常是些小股或单个的土匪，也有形形色色的小偷、流氓、骗子、扒手，以及共济会会员等无赖之徒。

冬天，我们的工作也并不轻松，但毕竟比春夏两季要好些。冬天我们要为春天的行动作准备，要与新的侦察机构取得联系，同时还要整理那些重大案件的详细记录，正如我们局长喜欢用华丽的词藻加以渲染的那样，这些案件对于罪行调查科学来说无不具有一定的意义。

作为局长秘密行动部门的助理，维尼阿明·马



雷舍夫满以为记者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他拿来两本贴满照片和绘有许多示意图的手抄记录簿，摊在记者面前。然而这位记者翻都不翻一下，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

“请你们注意，我不是历史学家。你们尽量给我来点新鲜的，你们知道，来点那个……”

说着，他又弹了一下舌头。

这一下我们可受不了了。他弹第一次舌头时，我们没吭声，可是他弹第二次舌头时，维尼卡·马雷舍夫便开口了：

“您听着，您以为这儿每次都要出人命案吗？您以为我们是白吃饭的吗？”

“你们在这儿是不是白吃饭我不知道。”这位报社记者鼻子里又哼了一声，再次冷笑道：“不过，本人到此地来是为了用艺术的方式了解最新鲜的，最能引人入胜的事件。很抱歉，我首先关心的是读者，而读者想要知道的主要是最新的事实……”

他的这番话同样惹得我们不痛快。

从年龄上看，这位记者并不比我们大，也就十七岁左右，充其量不过十九岁。光这一点就使我们感到莫大的耻辱。哼，他有什么了不起？！

他身穿狗皮袄，头戴兔皮帽，显得很神气。他傲慢地一再把帆布公文包打开、关上。这一切使我们在头一天没能下决心教训教训他，让他本分一些。

第二天他又来了，又一次吹毛求疵地翻着通报，不满意地皱着眉头，不时往小本子上记点什么。他时而咬着铅笔轻轻地叹息，叹息声中隐约流露出一丝哀愁。这种神情也反映在他那寒鸦一般圆鼓鼓的眼睛里。不知是因为寒气、强光，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对眼睛时常流着泪水。

他到底还是看上了一些案件。这时他心满意足了，从公文包里抽出十来支报纸卷的香烟招待我们大家。

就连这时坐在值班室里等候判决的小偷他也恩赐了一支。

然后他又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向我们解释说，尽管他姓乌泽尔科夫，名叫雅可夫，可在报上发表文章时却署名“雅库兹”。不知为什么他问我们是不是党员。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刑事调查局来。

我们刑事调查局严格规定对任何人都要一视同仁，比方说，对每位来访者（证人也好，小偷也罢），都要礼貌接待。虽然我们从没有违犯这些规定，可来访者到了我们机关照样感到胆怯。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应当说，就连我们对自己的机关也有几分畏惧。这是因为，在这里容不得任何人有丝毫的疏忽或放任。只要你犯了错误，超越了权限或违反了纪律，那就对不起了，请吧，请坐牢吧！

我们的局长曾经当过杂技演员。国内战争中他失去了两根肋骨和左手的三根指头，后因偶然的机

遇才来到西伯利亚。他特别喜欢安静，并且动不动就再三强调：“苏维埃政权要求我们什么呢？要求我们专心致志。我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在机关。什么样的机关呢？苏维埃政权机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都应……”

他还对我们说过：

“请注意，鲁莽是要人付出很大代价的。对此，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想想，想想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不可能把什么都装进你们年轻人的头脑里。你们每个人都应开动脑筋，进行独立思考，因此要肃静。”他两眼从角质镜框的上方把我们仔细而严厉地审视一番后，又问：“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了吧？”

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青年人。所以，我们这位首长自认有义不容辞的义务顽强地、象教育小学生一样地开导我们。他在训我们时，几乎总是板着面孔。

他把鲁莽视为恶习之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被这可怕而又有危害的恶习所影响。同时，他对自己也并不宽容。他确信，正是由于鲁莽，自己才在战争中失去肋骨和手指的。他说：

“我当时就是太冒失，想表现得比大家都高明。可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你们看，并非任何时候都须要雷厉风行，即使捉跳蚤，或者救火，也是这样。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条不紊、按部就班。”

得强调一点，他认为，肃静是秩序的主要标志。所以，我们局里狭长的，半明半暗的走廊也就格外的清静。走廊通向大楼深处，尽头便是局长办公室。宽敞的房间一分为二，外间作接待室，里间是办公室。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对局长的特殊身份深怀敬意，对自己的不无重要意义的本职工作也引以为荣。平时，我们在走廊里的消音地毯上来往总是小心翼翼的。

然而这位雅库兹，或称雅科夫·乌泽尔科夫，却毫无怯意。他到刑事调查局来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在衣帽间脱下狗皮大衣挂起来，呼呼喇喇地擤了半天鼻子，声音之大，令人吃惊，接着兔皮帽子也不摘，夹着公文包就径直闯进值班室。值班室里生着一个铁炉子。

走廊上摆着一张绿色长凳，这是公园里常见的那种铁腿呈外八字形的条凳。每天清晨，这张长凳上总是坐着一些等待传讯的小偷和证人，愁眉苦脸的，就象牙科医生候诊室里的病人一样。

乌泽尔科夫在火炉旁烤暖和以后，便到走廊上和那些小偷和证人谈起来，一谈就是半天。这是我们条例上绝对不允许的。可是对于乌泽尔科夫来说，我们的条例又算得了什么！他说他经常出入比我们局大得多的省刑事调查厅，然而那里的规章却简便得多。

他总爱强调他到处都可以通行无阻，并常常十

分随便地提起省厅一些工作人员的大名，诸如茹尔和沃罗别依奇克。这些人我们从未见过，不过他们的动人事迹倒是听到不少。乌泽尔科夫甚至还暗示我们，他和这些人颇有交情。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确切点说，我们也不愿相信。

不过，乌泽尔科夫也并不急于说服我们。在和我们交谈时，他总是漫不经心，语气也有些俏皮，并且两眼总是望着别处。

有一天，在值班室里他看见一名因有盗窃嫌疑被拘留的粮食投机商，这位投机商很胖。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

“这位红光满面的男子真胖得出奇，不禁使我想起《巨人传》里面的巨人。”

我就问他：

“巨人？谁是巨人？”

“你不知道？”他吃惊地反问了我不一句，然后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道：“不过，你也不可能知道……这是弗朗索瓦·拉伯雷写的一本书……”

我们那时当然不知弗朗索瓦·拉伯雷是何许人。不过，在雅科夫·乌泽尔科夫一声长叹之后，也就不便多问了。我们当时觉得他学识渊博。哪知他得寸进尺，更加卖弄自己的学问，以此来贬低我们。

有时他来得太早，局里的简报尚未打印出来。于是维尼卡·马雷舍夫便亲自给他找材料。

维尼卡从县值班人员那里拿来一本象圣经一样

厚的簿子，对乌泽尔科夫说：

“写吧：‘昨晚十时许，八名荷枪实弹的匪徒，摆脱追捕后偷袭了维谢拉亚·帕尔多维哈村的消费合作社……’”

“你用不着向我口述。我又不是小学生。只须告诉我最主要的就行了。没有你，我也能记下来。”

于是维尼卡把事件的主要经过讲了一遍。乌泽尔科夫记得倒是很快。可我们觉得似乎恰恰是最实质的东西他没能记下来。

我所担心的事后来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那些从县值班日志上摘抄下来的普通事实，在报上被歪曲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在报上，乌泽尔科夫大致是这样写的：“黄昏夜，消费合作社的守门人突然听到一阵可疑的声响。这是一个雾霭沉沉的夜晚，天空乌云密布。在天鹅绒般昏暗的天幕上，神秘地隐隐现出几个骑者的侧影……”

坦率地说，当时我挺喜欢雅库兹的写法。喜欢他的词藻。只是他不写真话，这使我不快。事实是，那天晚上既没有骑者，也没有乌云，有的只是徒步的匪徒和守门人，而后者在睡觉。

维尼卡·马雷金夫、科利亚·索洛维约夫，以及别的伙伴对乌泽尔科夫也很愤懑。

可乌泽尔科夫却若无其事，象从前一样到我们这儿来索取材料。

并且，事隔不久，他就福星高照了。

2

一天中午，冒着可怕的大风雪，说得确切些，冒着头一天晚上就铺天盖地刮起来的暴风雪，民警上士谢苗·沃罗比约夫象一团雪人跑来向我们报信说：

“克洛奇科夫匪帮离开泰加森林来到驿道上活动了。”

这在冬天可是出人意料的事情！

这伙匪徒在马列沃屯附近，在布耶尔和列维亚克村之间的乌图里斯克的叉道处打了个伏击。杀害三名社员，劫走了农民的几辆马车，然后不顾暴风雪天气继续向黄金谷方向流窜。

“我就马上赶到你们这儿来了。”民警上士沃罗比约夫一面用一把大梳子安然地梳着他那神父式稀疏的长发，一面报告说，“我是直接赶到这儿来的。”

“这以前你在哪儿呢？”我们局长皱着眉头看

了一眼沃罗比约夫，那模样仿佛要用长着粗硬的白发、修成“平头”的宽前额去抵他似的。

“这以前我在哪儿？”沃罗比约夫眼睛盯着局长办公室墙上的镜框反问道，“瞧您说的，在哪儿？象往常一样，在自己负责的地区跑来跑去呗。地区又那么大！前几天一位讲演的人还说，有两个……好象能容得下两个瑞士。又到处是土匪，再不然就是酿私酒的商贩。我一个人要跑两个区，我又不是三头六臂……”

“一切都清楚了。”局长扶了扶架在耳朵上的镜腿说道。他已不再听沃罗比约夫说些什么了，从墙上取下作战地图，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道：

“克洛奇科夫，就是说，指望暴风雪帮他的忙，因为暴风雪会遮盖他们的一切足迹。不过他毕竟是蠢到家了……听着，马雷舍夫，……四十分钟后我到这儿，”他用手指指着地图说，“你带一个班向这里靠拢。”他仿佛要把手指戳进地图似的。“没我的命令，任何情况下不得惊动任何人。我，”他移动着手指继续说，“请求轮训队派学员从这里支援我们。主要的是别让克洛奇科夫溜掉。能行吗？”

“我看……”

“我没问你怎么看，”局长打断了维尼卡的话说，“我问你行不行？”

“行。”维尼卡点了点头。

“好，行动吧！”局长命令说，“可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任何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张！如果土匪撤



离，就监视他们撤退的路线。这才对……”

这次军事行动当天晚上就结束了。

当七名活捉的匪徒和八具击毙的土匪的尸体从黄金谷用车拉回来时，我正在县里值班。

击毙的匪徒中，有前高尔察克手下的上尉，匪首叶夫拉姆皮·克洛奇科夫和他的十五岁的副官祖鲍克。据说，祖鲍克是国内战争中克洛奇科夫从某地拣来的。当时他还小。

在查明身份之前，被击毙的土匪尸体便堆在刑调局院内的雪地上，他们犹如一根根圆木，躺在装有窗格子的砖房前的阴暗处。

我提着《蝙蝠》牌马灯来到院内。

维尼卡·马雷舍夫良久地打量着死者。他身上披着一件皮袄，头上戴着一顶蒙古式狐皮帽，看上去真象个守夜的人，也象守夜人那样慢腾腾地向前移动着脚步，仿佛他的两条腿冻坏了似的。

我问他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得如何。

“糟透了！”维尼卡说着朝尸体把头一摆，“你瞧瞧，我们那位神经病——约瑟夫·戈卢布奇克干的好事！……”

我知道维尼卡不太喜欢戈卢布奇克。不过，我不明白他现在干吗发这么大的火。我把马灯举到尸体的上方一看，惊奇地问：

“怎么，这难道是戈卢布奇克砍的？！”

“啊，不。”维尼卡说，“克洛奇科夫，呸，